

# 关于荆江防汛抗洪若干问题的思考

刘克毅

(中共荆州市委员会, 湖北 荆州 434100)

**摘要:** 防汛防洪是江汉平原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永恒课题。锲而不舍地开展水利防洪工程建设才能永保荆江安澜。用先进思想和严明纪律组织起来的人民是夺取抗洪斗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要尊重规律, 正确处理好荆江与洞庭湖、水利防洪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与局部、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防洪与抢险、建设与管理的关系, 不断提高防汛抗洪斗争水平。

**关键词:** 防汛抗洪; 荆江治理; 工程建设

**中图分类号:** TV871 **文献标识码:** A

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 地处长江中游的荆州连续遭受了1998年和1999年“姊妹洪水”的猛烈袭击。面对历史罕见的滔天洪水, 荆州人民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严防死守、三个确保、决战决胜”的指示精神,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人民子弟兵强有力的支持帮助下, 在千里江堤上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洪斗争, 确保了长江大堤安全, 确保了江汉平原安全, 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荆州抗洪史上竖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总结1998年、1999年的抗洪斗争, 寻找治理荆江的规律, 使之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 一、防汛抗洪是江汉平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永恒课题

一部江汉平原的发展史, 从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人们认识荆江、治理荆江, 与洪水抗争的历史。我国“堤防之设, 始自楚相孙叔敖”(公元前630年至公元前593年)。“孙叔敖治楚, 三年而楚国霸。”重视兴修水利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8年前后), 荆州刺史桓温令陈遵沿江陵城修筑江堤, 他是荆江大堤起源时期“金堤”的奠基人。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荆州太守赵贤见黄潭堤(今荆江大堤沙市附近)“堤浸如漏, 危不可救”, 便亲临最险处, 率众拼死抢救, 民

工深受感动, 劝其离开险处, 他泣曰:“堤溃则无民, 无民安用守。”这些封建士大夫都认识到主政荆州, 保障堤防安全乃是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他们得出了“为政之要在江防, 而江防之要在万城一堤(荆江大堤)”的论断。尽管这一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官箴在走马灯似的风云人物中代代相传, 但由于政治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 荆堤永固、荆江安澜在1949年以前始终只是荆州人民的一个良好愿望。(本段引文出自《荆州府志》清光绪元年刊本)

据《荆州府志》(光绪元年刊本)记载,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450年间, 荆州江河堤防溃口达186次, 平均2~3年一次。特别是1860年、1870年两次特大洪水给荆江两岸造成了毁灭性的灾害。在1931~1949年的18年间, 荆州就有16年遭受水灾, 几乎年年淹水。

有人说, “江之利在蜀, 江之害在楚”<sup>[1]</sup>。长江流域地势西高东低, 形成三级巨大阶梯。江汉平原就处于第三阶梯的最西缘。这里江面开阔, 河道蜿蜒, 九曲回肠, 水网交织。“江出西陵, 始得平地, 其流奔放肆大, 南合湘沅, 北合汉沔, 其势益张”<sup>[1]</sup>, 这是江汉平原特殊地理位置和复杂江河水系的真实写照。江汉平原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雨汛同期、雨量充沛且时空分布不均。荆江河段每年要承纳上游100多万平方公里来水面积汇流的暴雨洪水近5000亿立方米。安全泄洪能力仅为 $5 \text{万 m}^3/\text{s}$ 的荆江河段在过去的850年里承纳大于 $8 \text{万 m}^3/\text{s}$ 的洪峰流量有8次, 大于 $9 \text{万 m}^3/\text{s}$ 的

有5次。1860年、1870年两次大洪水枝城站洪峰流量均达 $11\text{万 m}^3/\text{s}$ 左右,至于洪峰流量大于 $6\text{万 m}^3/\text{s}$ 的就更多了。人们常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比作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无奈,荆江两岸人民对这句话的体验更是刻骨铭心<sup>[1]</sup>。

有人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上起枝城,下迄城陵矶,全长337公里,以其流经古荆州而得名。荆江两岸曾是云梦古泽,属冲积平原,土壤覆盖薄,透土层厚,不少堤防建在古河床故道之上,基础十分不稳。从三峡汹涌而至的洪水在这里左冲右突,造成荆江堤防大量的崩岸、管涌、漏洞等险情,如若抢护不当,常陷人于灭顶之灾<sup>[1]</sup>。

有人说,“荆州不怕干戈动,只怕南柯一梦中”。荆江两岸堤防形如长蛇,密如蛛网。现有荆江大堤、长江干堤868公里,以及沮漳河、东荆河及荆南四河堤防达1478公里。这些防洪设施有效地保护着荆江两岸的1800万人口、153万公顷耕地和重要城市大武汉、京广铁路以及一批重要的工矿企业、基础设施等。荆江防汛抗洪远非一垆一乡、一城一地的局部得失,而是事关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大局,事关保卫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重要斗争。荆江一直是长江抗洪的主战场<sup>[1]</sup>。

有人说,三峡工程建成后,荆江防洪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事实上,三峡工程虽对防御特大洪水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绝不可能一劳永逸。三峡工程建成后,荆江河段防洪标准可由现在10~20年一遇的大洪水提高到百年一遇。若再遇到1954年型洪水,可以不使用荆江分洪区,特别是可以避免特大洪水时因荆江大堤溃口而造成的毁灭性灾害。但如果超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荆江河段仍要承受巨大的超额洪水压力,仍必须靠提高荆江两岸防洪工程能力来减轻洪水灾害的防洪效益,还必须在整个工程竣工后才能实现。因此,最近10年间将是荆江防洪最为险峻的时期。

荆江防洪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要荆江存在,就会有洪水发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环境资源的变化和灾害损失的增大,荆江防洪的地位和作用将更为重要。

## 二、锲而不舍地进行防洪工程建设是永保荆江安澜的根本措施

1998年大水之后,荆州全市共组织100多万劳力、近万台机械投入水利防洪工程建设。施工上严格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完善了施工、技术、监理、行政“四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共完成建

设总投资16亿元,整修加固江河堤防904公里,完成土石方7976万立方米,其投入之大、完成工程量之多,超过了前十年的总和。

水利大投入带来防洪大效益。与1998年汛期相比,同样高的水位、同样长的堤段、同样严重的汛情,但1999年堤防险情大为减少,抗灾消耗大为降低,洪灾损失大为减轻。1999年堤防发生重点险情54处,仅为上年同期的17%,监利、洪湖长江干堤上的险情只有上年同期的10%,加筑子堤长度不及去年2%。抢险消耗砂石料8万立方米、编织袋3000万条、资金2.3亿元,分别为上年的28%、23%、26%。1998年洪水淹没农田面积6万公顷、转移灾民42万人,1999年除已经移民建镇的监利新洲垸破口行洪淹田约333公顷外,其它农田都夺得了丰收。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17.28亿元,仅为上年的24%。1999年抗洪斗争证明:如果没有1998年冬大规模的堤防建设,1999年汛期荆江两岸就会再打一场消耗战,甚至会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1998年冬堤防大整治,利在1999年,功在千秋。大规模的堤防建设,给饱受洪患之苦的荆州人民特别是监利、洪湖人民带来了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次生产力的大解放。荆江防洪标准的提高,堤防抗洪能力的增强,使沿江人民的生命安全有了更可靠的保障,免除或者大大减少了因灾害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人口转移和大量劳力消耗及灾后疾病发生。防洪工程虽然不能直接带来资产的增加,但可以避免和大大减少洪灾造成的淹没损失,大大节约抗洪抢险和救灾的物质资金投入,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荆州水利建设任务大、难度大、影响大,要从根本上解决好水利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坚持不懈地连续大干,建立一个与三峡工程相配套、与两岸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标准的荆江防洪体系,才能永保荆江安澜,实现长治久安,这是荆州民众在抗洪斗争中形成的共识。

(一) 继续坚持“抓荆堤、带全局、保安全”的思路,努力把荆江大堤建设成为“中华第一堤”

荆江大堤是长江流域历史最为久远、位置最为险要、地位最为突出、保护范围最大的国家确保堤段,素有“金堤、皇堤、命题”之称。荆州市委、市政府积极倡导创建“中华第一堤”活动,已使荆江大堤的堤容堤貌大为改观,抗洪能力明显增强,在1998、1999年抗洪斗争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发挥了巨大防洪效益。要继续坚持以整治崩岸、填塘固基、查处隐患为重点,加快建设步伐,提高管理水平,力争尽快把荆江大堤建设成为防洪能力最强、堤防质量最好、工程管理最优、综合

效益最大的名副其实的“中华第一堤”。

## （二）继续开展以基础处理为重点的堤防加固工程建设

今后一个时期，荆州防洪的重点是堤防，堤防的重点是堤基处理。要对荆江大堤、长江干堤、东荆河堤、分蓄洪区围堤、荆南干堤、荆南四河支堤等主要堤防全面整险加固。由于荆江堤防基础差、砂基多，极易诱发管涌险情，必须采取“外截内压”的加固措施，增加堤内复盖层，改善堤基渗流状态。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处理堤防基础<sup>[2]</sup>。

## （三）继续实施荆江河势控制，巩固下荆江裁弯成果，抓紧崩岸整治

只有稳定的河势，才有稳固的堤防。荆江“九曲回肠”，河势摆动频繁，目前两岸仍有33公里河势尚未完全控制，已护岸段局部的崩塌年年发生。必须从荆江防洪的全局着眼，加大河道整治投入，加快荆江河势控制步伐，尽快实施石首河弯整治工程，巩固下荆江裁弯成果，同时加大上荆江护岸工程的维护力度，巩固和发挥护岸工程的综合效益。

## （四）继续抓紧分蓄洪区安全设施建设，做到“分得进、装得住、吐得出”，保证分洪后“只淹地、少淹财、不死人”

荆州境内的5个分蓄洪区涉及面广、战略地位重要，区内人口密度大、经济发展快，但工程建设滞后、及时投入分洪有困难。1998年荆江分洪区33万人16小时大转移的实践证明，分蓄洪工程的建设现状还远远不能满足荆江防汛抗洪的需要，必须按照分蓄洪区建设总体规划，加强分蓄洪区的安全区（台）、躲水楼等就地避洪设施和转移道路、桥、码头等临时撤离设施的建设，建立有效的通讯、预报和警报系统。此外，分洪区的群众和大牲畜应尽可能就近安置，以减少转移成本，方便管理。要积极探索和建立分蓄洪区分洪损失的补偿机制，逐步改变现在分洪损失单纯依靠国家救济的办法，努力解除分蓄洪区人民的后顾之忧。

## （五）继续加大荆南堤防建设力度，尽快实施荆南洞庭湖区综合治理

荆南地区国土面积5516平方公里，在荆州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荆南“四河”是连接江湖的纽带，是江湖关系演变的焦点。近几年抗洪实践表明，无论长江洪水与洞庭湖洪水遭遇与否，荆南地区均会出现特大洪涝灾害，造成严重损失。由于工程建设的严重滞后，目前荆南地区的防洪能力同整个洞庭湖区相比已经有了较大的差距，是荆江防洪工程中的突出薄弱环节。综合治理荆南地区，不仅有利于荆南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经济，而且对整个荆江和洞庭湖

区防洪具有巨大作用。根据荆南水患，势在必行，不能拖、不能等，应该尽快上马，抓紧实施。

## 三、用先进思想和严明纪律组织起来的人民是防汛抗洪胜利的决定因素

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与洪水的抗争则是对洪水这一客观存在人为的积极、能动的反映，是主观作用于客观的伟大实践。荆江两岸任何一项水利防洪工程的成就，无不反映荆州劳动人民在认识荆江、治理荆江过程中的无穷智慧和艰辛。与荆江洪水灾害长期斗争的实践证明，在意志薄弱者面前，天灾就是灭顶之灾；在强者面前，天灾并非不可抗拒，只要团结协作、奋勇拼搏，就可能人进水退、水涨堤高。

气吞山河的抗洪斗争铸就了伟大的抗洪精神。荆州军民在1998年抗洪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精神风貌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充分肯定。这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充分体现，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压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革命加拼命精神，是荆州人民“筚路蓝缕，和衷共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的传统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各级党政领导是1998、1999年抗洪斗争的决策者和指挥者，是带领人民群众战胜洪水的主心骨和顶梁柱。他们肩负人民重托，身系千秋功过，既有钢铁般的意志和耐力，又有对水、雨、工情的科学把握；既能统筹全局、慎重决策，又能有胆有识、敢于负责。身处险境时，能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关键时刻，不但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且敢于修正错误、服从大局。在决一死战的关头，各级领导的责任重于泰山，沉着、果断、科学、周密的指挥往往是决定战役胜败的关键。

崇尚防洪责任，严明防汛纪律，是夺取抗洪抢险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抗洪抢险的决定因素是人，关键是每个人的责任心和纪律性。“争当治水功臣、不做历史罪人”，“谁负责修堤、谁负责防汛”，“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这是广大抗洪军民的共同誓言和一致行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险情就是命令，这是防汛抗洪的行为准则，是夺取抗洪斗争胜利的政治保证。奖惩严明、赏罚公正，才能有效保证防汛队伍的坚强战斗力。团结奋斗、顽强拼搏与

科学决策、科技手段相结合,就能形成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1998、1999年抗洪抢险胜利靠的是科学决策、科技手段、科学调度,打的是一场智能仗。

抗洪英雄模范人物是用先进思想和严明纪律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杰出代表。荆州共有35位优秀儿女在1998、1999年抗洪斗争中壮烈牺牲。他们面对滔天狂澜、拍岸惊涛,气宇昂然、勇往直前,为了保住大堤的安全,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把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看得比个人的生命还重。他们是大堤的脊梁、时代的骄傲。

#### 四、因势利导、尊重规律、不断提高防汛抗洪斗争的水平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人与荆江的斗争始终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只有不断认识荆江变化的规律,才能驾驭荆江,造福人民。

##### (一) 要正确处理荆江与洞庭湖的防洪关系

荆江与洞庭湖的关系是长江中游防洪形势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江湖关系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洞庭湖萎缩和“四口”河道的淤积导致“四口”入湖水、沙量的逐年递减,是江湖关系变化的总趋势。自1954年至1995年,洞庭湖面积减少1292平方公里,容积减少101亿立方米。1998年与1954年比较,“四口”分流值减少9800 m<sup>3</sup>/s,分流比由40%降至27.7%。恶化的江湖关系对洞庭湖不利,对荆江干支流和整个长江中游防洪更不利。江强则占湖,湖强则抗江。江湖关系的变化造成了城陵矶附近水位明显抬高,荆江防汛负担加重。必须把加高加固荆南堤防、疏浚“四口”河道,扩大“四河”泄量,恢复洞庭湖调蓄能力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加大泄的力度,减少蓄的损失<sup>[3]</sup>。

##### (二) 要正确处理防洪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荆州人民与荆江洪水斗争的过程,从经济角度看,实质上是荆州经济发展与荆江防洪能力相互促进的过程。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对防洪的迫切需要,防洪的需要促进了防洪技术的进步,而防洪技术的进步和防汛斗争的胜利,又反过来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基本的生产条件和重要的物质基础。现在,无论是江北还是江南,无论是保护区还是分洪区,甚至是人口集中的民垸,哪一块都有沉甸甸的含金量,哪一块都淹不起。加强防洪工程建设,减轻洪水灾害,不仅有利于保障荆州和全省乃至整个长江中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有利于创造更好的开放开发环境,更好地实施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战略,加快经济的发展,这是一项具有战略

意义的工作。荆江防洪规划和建设必须与经济发展布局相结合,为经济建设提供有利条件。与防洪相关的经济建设要进行洪水风险分析,做好灾害风险评估。要突出城市防洪建设,提高城市排涝标准。要加强荆江防洪的经济研究和社会、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

##### (三) 要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荆江防洪涉及自然环境、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远远超出了技术的或工程的层面,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要正确处理好荆江大堤、长江干堤与支堤民堤、一般民垸的关系,确保重点,区别对待。必须要有舍小保大的思想准备。要认真执行防洪预案,进退有度,切忌蛮干硬拼。要适当提高长江干堤的防洪标准,主要是质量标准,近期抓好除险加固工作,长远务求逐步达标。对影响堤防安全的穿堤建筑物、堤身及堤基有渗漏、堤岸崩塌等险情隐患应首先处理。

##### (四) 要正确处理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的关系

单纯依靠加固堤防来提高荆江的防洪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堤身越高,群众负担越重,修守困难越多,风险越大。在现有工程条件下,防御荆江大洪水和特大洪水还必须利用非工程措施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减少经济损失。必须加强荆江洪水灾害和防洪措施的系统宣传,增强全民水患意识和防洪意识;认真贯彻执行《水法》、《防洪法》,把防汛抗洪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加强防汛指挥系统和抢险组织系统建设;严格管理控制河湖洲滩和分蓄洪区的人口机械增长、滥占土地;及时清除各类行洪障碍,杜绝新的人为洪障和“人造险情”。

##### (五) 要正确处理防范与抢险的关系

防汛抗洪必须坚持建重于防,防重于抢,抢重于救的方针。1998、1999年抗洪斗争说明,大水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充分的准备;洪峰并不可怕,怕的是人的思想麻痹松懈;险情并不可怕,怕的是不能及时发现。1998年大水之后,荆州市各级政府找差距、找问题、找不足,正确对待1998年防汛抗洪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正确对待冬春水利防洪工程建设的成绩和问题,正确对待中长期天气和汛情预报,在加固长江大堤的同时加固精神大堤,为战胜1999年大洪水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抗洪斗争决战在汛期,功夫在平时。汛前必须抓好各项准备工作的落实,保持各类防洪设施的完好状态,备足防汛抢险物料,组织落实防汛队伍,制定各种应急预案并进行必要的演习。入汛之后,突出严防死守,强化巡堤查险,抓好“查、抢、守”和“巡堤、抢险、防风浪”等重点环节,开展连续不断的拉网式巡堤

查险,加强防汛督查督办,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所有堤段、每个环节。实践证明,只要发现报告及时,处理方法正确,组织抢护得力,再大的险情一般都可以排除。

#### (六) 要正确处理建设与管理的关系

水利防洪工程的抗洪减灾能力和安全程度主要取决于工程的质量。必须坚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把质量放在工程建设的首位。管理是水利工作的基础。必须扭转水利工作中长期存在的“重建轻管”现象,坚持建管并重,把工作重点转到向管理要效益,走内涵发展的路子。除工程管理外,还要管好河道和天然湖泊。严格控制河湖洲滩的开发利用,保持蓄泄能力。要严格依法管理工程,加大建设管理达标力度。由于洪水灾害发生的随机性,各种防洪工程和防洪设施都处于非经济运行之中,要积极研究在不影响其防洪需要的

前提下,合理利用行蓄洪土地,综合利用水利防洪基础设施,建立健全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使水利工程管理和防汛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 参考文献:

- [1] 《荆江大堤志》编纂委员会. 荆江大堤志[M].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89.
- [2] 水利部. 中国'98大洪水[M].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999.
- [3] 中共荆州市委政研室. 戊寅大水——'98荆州防汛抗洪实录[Z].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于华东)

(上接第16页) 这可以说是政治艺术评价中最敏感、最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对政治艺术及其运用过程是否具有道德性这个问题,人们始终争论不休<sup>[6]</sup>。

我们认为,政治艺术本身并没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剥削阶级可以运用它,非剥削阶级也可以运用它。这如同科学本身也不具有道德性一样。但政治艺术的运用是有阶级性的,即哪个阶级运用它,就赋予它哪个阶级的思想内容和手段。无论哪个阶级的集团或个人在运用政治艺术时,都要遵循一定的道德标准,只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罢了。每个阶级的集团或个人,都只遵循本阶级的道德标准。

有时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同阶级在某些政治艺术问题上具有相同的道德标准,但仔细分析一下,这里有一个口头上的道德与行动上的道德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口头道德与行动道德的一致性,也力图在行动中实现这种一致性,即达到目的、手段的一致性。但是一切剥削阶级总是表面上、口头上是—副道德标准,行动上、暗地里却又是另一副道德标准。

政治艺术评价中不能忽略创造性的判断。因为政治现实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以固定不变的政治艺术去应付千变万化的政治现实显然是不明智的。再好的政治艺术理论也不可能适应所有的政治实践。所以,从政者运用政治艺术的过程就是一个政治艺术不

断创新、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即使此时此地的政治现实与彼时彼地的政治现实多么相似,使用的政治艺术是如何的相近,也不能说是对已有政治艺术的原封不动的照搬,只要取得成功,总是或多或少地发展了原来的政治艺术。判断政治艺术是否具有创造性,其标准有二:其一是看历史上是否有相似的政治艺术,如果没有即为创新或创造;其二是看它是否成功,如果该项政治艺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要判断它是否具有创造性,就只能看它是否取得了成功。如果成功,则必然是运用者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否则很难取得成功。

#### 参考文献:

- [1] 刘振洪,高民政,文新明. 政治学导论(下)[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9.
- [2] 徐大同. 西方政治思想史[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 [3] 李斯. 权术论[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 [4] [美] 尼克松. 领袖们[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4.
- [5] [美] 伯特·爱德华. 领袖与疾病[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0.
- [6] [意] 马基雅弗利. 君主论[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责任编辑 涂文迁)